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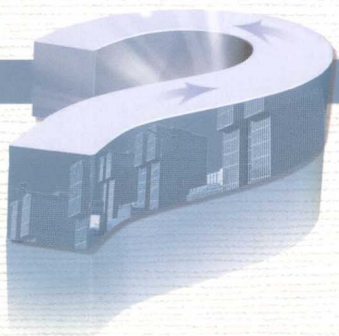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学文库 第二辑



社会转型： 中韩两国的考察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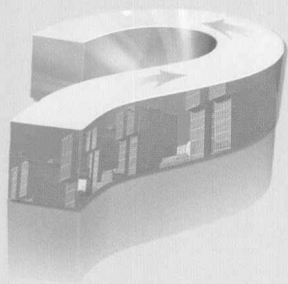
谢立中 郑根埴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现代社会学文库 第二辑



社会转型： 中韩两国的考察

谢立中 郑根埴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中韩两国的考察/谢立中，郑根埴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

（现代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5097-3742-2

I. ①社… II. ①谢… ②郑… III. ①社会转型-对比研究-中国、韩国-文集 IV. ①D616-53 ②D73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4472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

社会转型：中韩两国的考察

主 编 / 谢立中 郑根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郑 嫻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岳爱华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4.25

版 次 / 2012年10月第1版

字 数 / 409千字

印 次 /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742-2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outh Korea

《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

出版说明

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筹划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文库》，希冀汇总中国社会学优秀作品，引介国外社会学优秀成果，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十多年过去了，这套文库粗具规模，在社会学界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逐渐走向成熟，学术从业者的训练也逐步专门化，并有大批海外学子学成归来。在此，有必要在社会学面对中国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在学术从业者构成以及知识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重新组织一套社会学研究丛书，以推动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十年来在社会学图书的出版方面着力甚多，陆续出版了多套社会学丛书，比如《清华社会学讲义》、《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民族与社会丛书》等，并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基地。在这种条件下，《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的取向将是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普遍推广的社会学讲义。这类讲义必有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鲜活的中国经验，必有对过往经验的反思以及基于实践的创新。二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和理论专著。学者基于扎实的调查而形成的著作是重点。此类著作当有深刻的理论思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范本。

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产生了丰富的中国经验。社会学学者当能生产出更加丰富的知识，才能无愧于这个我们身在其中的伟大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愿以微薄的力量参与其中。愿此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作一份贡献，也愿与社会学界的朋友一道，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新成长阶段的更大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中于北京华龙大厦

编者前言

2009年11月28日，在金大中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长、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韩相震教授的推动下，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首届双边学术研讨会。来自两系的14位社会学教授和13位社会学研究生齐集一堂，围绕“中韩两国的社会转型”这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一天的讨论和交流时间虽然不长，但双方一致认为这样的交流活动很有必要。它不仅加强了两系师生的相互了解，而且增进了双方的感情和友谊，尤其是为两系年轻一代学者的交往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大家均希望将这一交流活动持续地进行下去。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相互了解，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郑根埴教授在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就双方未来的交流计划进行协商时提出，希望能够以此次讨论和交流的成果为基础，双方共同编撰一本以“中韩两国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学术文集，将两系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收入其中，供双方的教师和学生了解双方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现状时参考。谢立中教授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本书就是双方的教授们共同落实此一建议的最终成果。

按照双方最初讨论时的设想，本文集拟由双方各选十位左右的作者，以“一对一”的方式围绕“中韩社会转型”的不同方面分别进行具有对比性质的描述和分析（例如，一位韩方作者和一位中方作者共同就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化问题分别对自己国家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难度不小。这不仅是因为双方教授们的研究兴趣难以完全一一匹配，而且因为双方的社会转型在

内容和问题方面也不一定能完全对应。因此，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文集，虽然编者在编辑过程中依然努力遵循“一对一”的原则或逻辑，但双方论题的不对称之处也显而易见。当然，反过来看，这或许是歪打正着，正好可以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双方社会转型的相异之处吧。

按照双方拟定的计划，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二届双边学术研讨会已于2011年11月4~6日如期在首尔大学举行。来自双方的17位教师和16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在会议上进行了演讲。按照双方拟定的计划，下一届双边学术研讨会将在中国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其他合作计划也在逐步的实施过程之中。我们期待并相信，随着双方各项交流活动的进一步展开，双方的了解、友谊和共识都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编 者

2012年1月3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第一篇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	
-----------------------------	--

.....	谢立中 / 3
-------	---------

中国大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	--

——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为例	陆杰华 白铭文 柳玉芝 / 16
------------------------	------------------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刘爱玉 / 32
-----------------------	----------

制度引导下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	
----------------	--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宏观演化分析	邱泽奇 / 54
---------------------------------	----------

性别、阶级与城乡重合的身份和社会流动	
--------------------	--

——以小型餐饮业为例的研究	佟 新 / 80
---------------------	----------

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	朱晓阳 谭 颖 / 93
---------------------------	--------------

当代中国宗教变迁	卢云峰 / 117
----------------	-----------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浪潮	刘 能 / 131
------------------------	-----------

退“公”进“私”：政府渗透商会的一个分析	刘世定 / 154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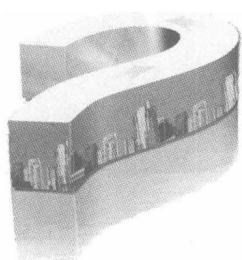
经济不安全和全球化背景下变迁的中国福利体制：政策与实践	
-----------------------------	--

.....	熊跃根 / 175
-------	-----------

第二篇 当代韩国的社会转型

当代韩国的社会转型

——迈向竞争化市民社会的三种主要推动力	韩相震 / 197
韩国的人口与家庭	朴庆淑 / 221
韩国的城市化与城市贫民问题	郑根埴 / 244
韩国人的社会资本：人脉、信任、透明度	李在烈 / 262
韩国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	洪斗承 / 280
复合风险社会：压缩性现代性和韩国的风险秩序	张庆燮 / 295
现代韩国的社会和宗教	朴明圭 / 311
韩国社会运动的展开：以社会运动团体的作用为中心	林玄镇 / 327
韩国的企业集团支配结构	张德真 / 341
韩国社会保障的现状与面临的课题	具仁会 / 368



第一篇

当代中国的 社会转型

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 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

谢立中

一 雷默的“北京共识”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在这篇研究报告中，雷默明确地宣称他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雷默，2005：1）。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在使这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使中国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榜样力量而对当前的世界发生重要的影响。雷默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其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雷默，2005：6）

按照雷默的说法，“北京共识”是由一套“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以及“关于为什么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组成的。这三个定理如下。

(1) “第一个定理，是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雷默，2005：12）“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雷默，2005：15）

(2) “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第二个定理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雷默，2005：12）“第二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雷默，2005：19）

(3) 最后一个定理是，“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雷默，2005：13）“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虽然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①（雷默，2005：32）

这三个定理构成了“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而其中的前两个又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创新”和“公平”因此也被确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概念）（雷默，2005：23）。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所包含的这些新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即所谓“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它表明“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上的”（雷默，2005：46）。中国发展的成功则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雷默，2005：7）

^① 所谓“非对称力量”指的是只在某些关键领域或方面而非各个领域或方面都能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军事力量。

雷默有关“北京共识”的说法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一套说法呢？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一套说法是准确的吗？它真的是一套有关发展的“新物理学”吗？如果我们不想作为一个被动的思想消费者盲目地接受雷默的这一套论述，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却发现，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回答以下这样一个问题，即：雷默所谓的“北京共识”到底是一套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发展道路及历史的经验总结呢，还是对中国在近几年来刚认识到并准备付诸实施的某些新思想及其发展思路的新概括或新表述？这个问题显然构成了回答前面那些问题的前提。因为，熟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调整和转折。中国政府在近年来所确立的新发展战略与这之前的发展战略尽管存在相当程度的连续性，但也有着重大的差别。因此，弄清楚雷默的“北京共识”到底是对中国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对刚确立的新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我们如何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说法，而且对于我们如何恰当地理解中国发展的经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从雷文本身来看，他所谓的“北京共识”既像是前者，又像是后者。而从该文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反应来看，则多数好像是将其作为前者来加以理解。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雷默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一大批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讨论。因此，为了恰当地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套论述，也为了恰当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能需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对雷默的论述进行评价。第一个角度，是假定雷默的“北京共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第二个角度，则假定雷默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政府近年来确立的新发展模式的简略表述。

二 作为中国发展经验之总结的“北京共识”

首先，让我们假定雷默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那么，紧接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雷默在其所谓“北京

共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形吗？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真的如雷默说的那样是源自对“创新”和“公平”等核心原则的认同和坚持吗？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简单地做出回答。

先来看所谓“创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是否确实是源自对“创新”原则的坚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创新”一词的含义。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创新”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可以根据其来源区分为引进性的技术创新和自主性的技术创新。如果雷默所谓的“创新”指的是制度创新和引进性技术创新，那么可以说，雷默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对“创新”原则的坚持这一说法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创新”理解为“自主性技术创新”的话，雷默的说法显然就不符合事实了。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虽然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以全要素生产率来测量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40%左右）（寇宗来，2008：5~6），但这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引进海外技术成就的结果，而非中国本国自主技术创新的结果。例如，寇宗来的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许多大中型企业宁可放弃自己的研究开发，转而从市场交易，尤其是从国外获取先进技术。……通过合资将国外先进技术国产化成为很多大中型企业在中国市场中生存的基本法则。”“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引进来源主要来自国外。在2003年以前，购买国内技术支出占总引进费的比例都在15%以下。”（寇宗来，2008：76~77）刘霞辉等人也指出，“有人形象地将中国技术进步的演进路线比喻为‘80年代靠老农，90年代靠老外’”。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来自于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技术转移，‘干中学’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203~204）。此外，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主要是靠资源投入和引进带来的技术进步这一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有明确的肯定。

再来看所谓“公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果然是源自对“公平”“平等”之类原则的坚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虽然“共同富裕”始终被表述为最终的奋斗目标，但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

初真正在各项政策中得到落实的首要原则却主要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结果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初期的一段时间之外，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逐渐提高。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走高，从 0.3 左右一直提升到 0.45 左右（参见表 1）；迄今为止，其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居高不下，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如果一定还要坚持把“公平”理解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不知让人该做何感想？

表 1 中国三种基尼系数的变化

年 份	城乡居民基尼系数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农村居民基尼系数
1978	0.333	0.160	0.212
1983	0.340	0.150	0.246
1988	0.355	0.230	0.302
1993	0.389	0.270	0.329
1998	0.393	0.300	0.337
2003	0.443	0.340	0.370
2006	0.448	0.326	0.351

数据来源：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80~81）。

可见，如果把雷默的“北京共识”理解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至少在“公平”这一条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三 中国发展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相矛盾吗？

雷默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北京共识”，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将其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照。雷默认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与“华盛顿共识”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有必要将其总结出来，并冠之以“北京共识”的名称，以突出其作为一条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含义。然而，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这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完全对立的看法也是不适当的。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它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于 1989 年在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中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名称，主要指威廉姆森“个